

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的跨国流动与流散书写—— 以文莱一凡为例*

Transnational Flow and Diaspora Writing of Chinese Female Writers in Southeast Asia——The Case of Yifan from Brunei

马 峰**
(MA Feng)

摘要

在东南亚区域内部的跨国流动群体中，一些华文女作家不仅是跨国流动的切身参与者，而且也是流散议题的重要书写者。在淡莹、尤今、煜煜、商晚筠、李忆蓓、贺淑芳等东南亚区间跨国流散华文女作家之中，一凡有着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的跨国流散历程，其多元流散书写尤为典型。一凡的流散书写特征鲜明，一方面是对东南亚区间的在地书写，表现为古晋、文莱的家国情结以及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情结；另一方面，是跨区域的异地书写，有寄情于中国的文化原乡情结书写，还有超越国别族群的多元乡愁情结书写。

关键词：东南亚华文女作家、流散书写、文莱、一凡

Abstract

Among the flowing transnational groups in Southeast Asia, Chinese female writers are not only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in the transnational flow but are also important writers on diaspora topics. Among the transnational diasporic Chinese female writers in Southeast Asia, such as Danying, Youjin, Yuyu, Shang Wanyun, Li Yijun, He Shufang, etc., Yifan has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 in Singapore, Malaysia, and Brunei. As a result, her varied diaspora writing is particularly typical and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n one hand, hers can be considered local writing of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plots set in Kuching and Brunei as well as Nanyang University in Singapor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ransnational writing, which includes writing the cultural hometown in China, plus the writing of the various nostalgic feelings that goes beyond country and ethnic groups.

Keywords: Chinese female writers in Southeast Asia, diaspora writing, Brunei, Yifan

*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的中国叙事研究”（YB2022082）、“兴滇英才支持计划”项目、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1130019）成果。

** 马 峰 云南大学文学院讲师。电邮地址：369733219@qq.com

一、前言

在东南亚区域内部，临近各国之间常常出现大批量的移民流动，可以称之为“东南亚区间跨国流散”。他们表现出很高的跨国自由度，在两国或多国之间往返流动，或持临时签证暂居他国，或保留原籍而定居他国，或入籍他国仍往返母国。这种东南亚区间跨国流散现象，主要是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输送劳动力及人才，比如马来西亚（尤其是柔佛州）向邻国新加坡的移民输送，东马（尤其是砂拉越州美里市）向文莱的移民输送等。在这些移民流动之中，高层次人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尤其以“南洋大学”时期的新加坡对东南亚各国华文人才的吸纳力最强，其中也培养或吸引了数量可观的华文作家及文化人士，比如王昭英（一凡）、刘华源、黄孟文、王润华、刘宝珍（淡莹）、陈立桐（田思）、陈瑞猷、廖建裕等。在“后南洋大学”时期，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南洋理工大学依然成为东南亚华文人才求学或工作的聚集重镇，如黄文斌、黄琦旺、廖冰凌、游俊豪（游以飘）、李永乐、林志敏、叶秀清、贺淑芳、杜忠全、刘海莲、黄文青、彭念莹等。

在东南亚区间的跨国流散群体之中，淡莹、尤今、一凡、煜煜、商晚筠、李忆著、贺淑芳等华文女作家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进一步划分，淡莹、尤今是从马来西亚移居入籍新加坡的跨国流动，早已归属于新加坡华文作家；商晚筠、李忆著是到新加坡工作而后重返马来西亚的跨国流动，毫无争议地属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贺淑芳是自马来西亚留学新加坡的新生代，仍属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煜煜游走于砂拉越美里与文莱两地之间，她既是砂拉越华文作家、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也是文莱华文作家。其中，文莱华文女作家一凡有着多元的东南亚区间跨国流动经历，与之关联的流散书写也极为典型。

一凡¹（1939-2020），原名王昭英，另有笔名宁静，祖籍福建闽清。1939年出生于新加坡，成长于砂拉越古晋。1962年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中文系深造，1968年随丈夫刘华源定居文莱。在创作历程上，六十年代初，她在马华诗人吴岸主编的《拉让文艺》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此后，直至1993年7月25日才在“汶莱留台校友会写作组”主编的《思维集》上发表重新执笔的第一篇作品。“一九九五年至九六年，我出任《思维集》编辑，在砂拉越美里的三家华文报：《美里日报》、《诗华日报》及《国际时报》主编每月一期的《思维集》。……由于

¹ 一凡以散文及微型小说创作为主，亦兼及评论及诗歌，主要著作有诗文集《洒向人间都是爱》，散文集《跨越时空的旅程》，微型小说集《一凡微型小说及其赏析》，综合文集《感时花溅泪》，与丈夫刘华源合集《双飞集》等。除了个人著作单行本，她的作品还被收入多种区域性的文集及个人编选的选集，部分微型小说收录于《微型小说鉴赏辞典》《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细微的雕塑：世华微型小说评析》《走出沙漠》《星空点灯》等，还主编过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出版的《东南亚华文文学选集·汶莱卷》等。她曾担任新加坡《新世纪学刊》编辑顾问，《新世纪文艺》副总编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期刊顾问，文莱华文文艺副刊《思维集》《五属文苑》（均寄刊于东马华文报）编辑，《东盟文艺》撰稿人，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董事，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受邀理事，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第五届冰心文学奖评审委员等。笔者按：Brunei常用译法有“文莱”“汶莱”两种，除引文保留“汶莱”用法，其他统一使用“文莱”一词。

这三家华文报都有汶莱版，报道及刊登有关汶莱的消息，汶莱华人都视它们为本国的华文报。（《回首来时路》）²对此，她也坦诚直言，担任文艺副刊编辑的两年是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由于文莱国内并无华文报，因此“跨国流动借版”就成为文莱华文作家的创作常态。在某种程度上，迫于缺乏本土华文文艺园地的现实窘况，文莱华文作家的跨国借版发表也算是别具一格的“集体流散书写”。

在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一凡的散文创作给予较高肯定。她在散文、微型小说及评论方面都颇有建树，尤其以散文见长。钦鸿指出，“她的散文，大多取材于她从事文学活动时的见闻感想，以及自己切身经历的家国之情和亲朋之爱。”（钦鸿 2002：268-269）在创作风格上，有论者认为，“她在作品中表现的随遇而安的心态，相思相守的精神企恋，显然不同于一般女作家的茜纱窗下玫瑰色的梦。她是以女性的婉秀与清丽为基调，又吸纳了男性的刚健与豪气，从而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芮华、赵联：62）此外，关于一凡的创作评介大都收录于《一凡微型小说及其赏析》《山岩上一泓飞珠溅玉的清泉：一凡文学意境探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一凡的作品主题及创作风格的勾勒，尚缺乏结合其跨国流动经历的流散书写研究。

一凡是东南亚典型的多元流散作家，她不只有东南亚区间内部的多国流散，还有东南亚与英国的跨区域流散。在流散历程中，新加坡是出生地与大学深造地，砂拉越古晋是成长地与中小学求学地，英国伦敦是留学成家地与子女陪读地，文莱马来奕则是婚后的长久定居地。她拥有新加坡公民籍，虽然嫁到文莱，但是只持有签证准入居留。对于自己从小到大的多元流散路，一凡在作品中往往自然呈现，具有鲜明的流散书写特征。具体而言，有对中国的文化原乡书写，有对马来西亚古晋、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出生成长书写，有对文莱马来奕的在地家园书写，还有超越国别族群的多元乡愁书写。

二、中国的“原乡情结”

一凡是马来西亚的华校生，后就读于新加坡华文高等学府南洋大学中文系，深厚扎实的华文根基让她对中华文化格外倾情，在作品中则表现为对祖籍国中国的“原乡情结”。虽然她与中国并无切实关联，更多源自父母辈的亲缘关系，但是透过“神州”“巨龙”“龙的传人”“炎黄子孙”等极具情感趋向的用词，经由中国原乡想望催生而成的精神家园便自然建构起来。正如作者所言，“唯物史观，曾经是我的哲学家园。中华文化则是我的文化故乡。带着它们，我在每一个新的落脚处，构筑我的精神家园。我的乡愁，异乡的漂泊感，亦因此淡化了。（《茫茫宇宙谁主浮沉》）”（一

² 一凡、刘华源，2006，《双飞集》，新加坡：创意图工作室，页102。《双飞集》是夫妻二人合集，其中王昭英的作品有五辑，刘华源的作品有八辑。刘华源，祖籍福建莆田，193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美里，成长于文莱马来奕。1962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工商管理系，1963年赴英国伦敦 Lincoln's Inn 攻读法律。1968年返文莱执律师业，至1989年投入文莱石油及天然气工程承包业多年，现已退休。曾任文莱马来奕中华中学董事长十年。现为该校永久名誉董事长、马来奕海南公会、文莱广惠肇公会、大埔同乡会法律顾问及文莱福建会馆会务顾问、新加坡“新世纪学刊”法律顾问等。

凡、刘华源：55）确切而论，这种“精神家园”基于对中华文化的深情热爱，对中国的原乡情结也就主要指向文化维度，或称之为“中华文化情结”。

在文莱，一凡是中华文化的积极传承者与呼吁者，她甚至直接以岁寒三友（松、竹、梅）为三个孩子取名，透过名字寓意足可显见她的中华文化雅好。当然，她的文化关怀意识不限于居住地文莱，有时则表现为对海外华文文化的普泛关怀，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也堪称典例。她的中华文化情结不是讴歌颂扬型，而是融入更多的反思、批评与建言。就如《年糕的话》属于拟人化反思，借年糕自述凭吊海外中华文化的冷清境遇。《粽叶飘香话传统》则在端午节习俗中谈到海外华人的母语式微与文化遗产问题，建言海外华社三大支柱的宗乡会馆、华文学校与华文报在传统节日庆祝中不应局限于包粽子的形式层次，而应带出节日文化内涵，进而传承传统文化，更直言华族需要“文化祖国”。她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国也有文化关注，《农历新年说东道西》便写到印尼华人恢复舞龙舞狮的传统贺岁节目，借农历新年在印尼的浴火重生，展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中西文化与种族身份的双重碰撞中，她的中华（文化）情绪更加凸显。当年，他们夫妇俩从被殖民地到宗主国英国留学，身为华裔留学生曾遭受种族歧视的不公平对待，其深层原因则在于西方人对中国人及华人的固有偏见。“六十年代，正是中国开倒车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以一穷二白来形容当时的中国，毫不为过。中国的落后贫困，使我们这些身居海外的华裔留学生，亦倍受歧视。（《冬天随想曲》）”（一凡 2014：2）身在被歧视的异国他乡（英国）反而压抑激发出双重故乡想望，为北方故土（中国）与南方祖国（马来西亚）而共生忧患意识。于是，在中国准备腾飞的八十年代，她的回忆中充满深切的中国意识与华人意识。

在直接的中国书写方面，“神州”不只是文化情结的用词，她还将心中所系付诸于切实行动。在神州之行中，既有赴广州、重庆、三峡、武汉、黄山等地的旅游感念（《江山如此多娇：神州游杂感》），也有为四川灾区送温暖的援助义行（《天若有情天亦老》）。她去福建莆田涵江区寻根，作为在海外落地生根的华裔，在寻访中并没有刻骨伤感，有的则是对中国繁荣富强的自豪快慰。

对我们这群在南洋出生的华人来说，踏足神州的那一刻，既没有游子归乡的“近乡情怯”，也没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有的是一种要窥探及了解我们的祖先生长的地方的急切渴望，以及一种与自己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认同的赤诚之心。（《我们寻根去》）

（一凡 1998：28）

在“中华文化情结”的切身体验上，《我们寻根去》算是一凡的代表作，但其文化意义并非纯粹发自我体，复数叙述者“我们”已然具有海外华裔的群体代表性。身为海外华裔，她有爱憎分明的文化使命感。她对中国有反思与批评，从《牛棚杂忆》中反思文革浩劫的本质与根源（《季羨林的风骨》），短篇小说《深闺梦里人》则表现马来西亚侨眷的期望与失望。2008年，她为国荣（北京奥运会）而欢欣鼓舞，为国难（汶川大地震）中的道德勇气与美好人性而感动，也为国耻（毒奶事件）中的麻木

不仁与丑恶人性而愤慨不已，“巨龙！巨龙！拿出你的勇气来，化祸为福。巨龙！巨龙！是勇敢摔掉包袱，趁着荣耀的翅膀腾飞的时候了！我们，龙的传人，炎黄子孙，翘首盼望，你经此事件，轻身展翅高飞！（《国难、国荣、国耻》）”（一凡 2014：33）可见，她对中国有着浓郁的原乡情结，纵然偶有不满情绪与尖锐批评，但是出发点仍在于希望中国更加文明富强。

三、古晋与文莱的“家国情结”

一凡的少女时代在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砂拉越古晋（Kuching）度过，在她的成长记忆中，古晋当视为“第一故乡”，在作品中她常称之为马来西亚的“故乡K城”。在地志书写方面，虽然她的古晋篇章并不多，但是她的少年记忆与亲人回忆却大都与此地紧密关联。她年幼时便跟随父母从新加坡迁居砂拉越，古晋是父母的长居地与长眠地，因之也就具有“第一家国”的切实意义。她早年笃信唯物史观，晚年皈依基督教徒信仰主要是受母亲感染。她热心华社华教事务，则受到父亲当年废私立公的侨领气节所影响。她纪念母亲的《洒向人间都是爱》《母亲的“老”朋友》，还有表现父爱情深的《与父亲握手》等篇，其实都是古晋的家情维系。她每年都会返故乡古晋为父母扫墓，那时流散各地的兄弟姐妹才得以在老家团圆重聚。“自家的七兄弟姐妹，在动乱的时代，却应了一句俗话，《劳燕分飞》。现在除了我一人定居汶莱油城外，兄弟姐妹及另两位姐姐，却分别居住于新加坡，古晋及中国三地。（《又岂在朝朝暮暮》）”（一凡 2014：31）在她的家庭自述里，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东南亚华人家族的多元流散常态。

就“家国情结”而言，“第二故乡”文莱是自己新家庭的组建地与长居地，在居住时间以及感情积淀上都远胜砂拉越古晋。1996年，她的散文《第二故乡》获评首届冰心文学奖佳作，其核心题旨便是关于随夫定居文莱马来奕小镇的“家园情”。在文莱几近苛刻的国籍政策下，虽然她未获公民身份，但是对于扎根于此的家人而言，文莱即是实在的家与国，“家国情结”也就随时日渐长而愈趋浓重。

时光流逝，定居小镇，转眼二十多年。当年的异乡，如今已是我的第二故乡，孩子们魂牵梦萦的家园。我们已在此生根。像儿女包容母亲的缺点一样，我已接受小镇的种种不完美。这里虽许多人眼中的文化沙漠，然而它的祥和宁静，淳朴温馨，却是都市人梦寐以求的。

（一凡 1998：25）

在散文作品中，文莱书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世界上，文莱因盛产石油而享有“油城”美誉。在文莱风土民情的概貌书写中，“油城情结”也随处可见，有《油城无处不飞花》《仙鹤飞翔》对文莱和平之乡的美好祈愿，有在文莱接待到访的冰心女儿吴青教授及冰心文学馆馆长王炳根的文友情（《油城湖畔喜相逢》），有对马来奕小镇讲究恪守诚信的淳朴商人以及温馨邻里情的再现（《油城君子国》）等。在文莱家庭生活的个体书写中，有日治时代丈夫一家在文莱拉威小镇避难的历史书写（《只缘

身在此山中》），有庭院植竹的文人雅致与借“竹林七贤”的调笑自侃（《留得残竹听风声》），还有从饮食文学表现祖孙三代对热带水果榴槾的共同喜好（《闲话南洋万果之王》）等。其中，《九九重阳忆哥哥》抒发对夫家大哥的崇高敬意，“哥哥”是文莱第一代中国移民的代表，也是白手起家、事业成功的华侨先辈典范。他早年随父母从福建涵江南来，先落脚新加坡，而后移居文莱，曾慷慨捐赠一座两层高的教室大楼给马来奕中华中学。（一凡 2003：35）在哥哥儒商形象的回忆与形塑中，她对文莱侨领的仁风义举深表敬重，更暗含对华人文化传统与华文教育事业的殷切期待。

一凡在文莱书写中的一大亮点即是华文教育题材，她忧心于文莱华校的华文水平日渐低落，却并不悲观绝望，反而常为之声援助威。在满怀希望的华教书写中，《挽狂澜于既倒》便是一例，她有感于文莱中华中学对创意教学法的倡导以及列华文为必考科目的决心，“寄望汶中这一措施，能带动其他华校，突破目前华文教育式微的困境，让先贤一手创建的华校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其特质。华校固然要配合居住国的教育政策，但却不可因此辜负先贤创建华校的初衷。”（一凡 2014：123）在教育理念上，她主张立足文莱本土，又要兼承华校传统。同样，在《梦里不知身是客》里，作者既尽情参与华族的春节庆祝活动，也对自由和平的文莱国土心怀感恩。

对久居汶莱和平国的华裔，“梦里不知身是客”，却是反映他们对这块土地的归宿情感。尽管还有不少华族在身份证上还不是汶莱公民，但在久居客似主的情况下，他们早已融入这块土地。这块生于斯，长于斯，也将终于斯的国土。

近年来，随着中汶关系的日益密切，当局对华社政策的日益开放，更加深了汶莱华人对这个国家的归属感。

汶莱华人已在此落地生根，少有或几乎没有落叶归根的打算。他们只跟故国在文化上认同，没有国家意识和政治上的认同。

汶莱是我的家乡，汶莱是我的国家，我们热爱它——相信这是汶莱华族的真实的心声。

（一凡、刘华源：63）

由此可见，一凡对文莱的“家国情结”并未偏执一端，她对文莱的家国认同与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并行不悖。这种双重认同观，其实也是文莱华族在身份认同上的普遍共识。

四、新加坡的“南大情结”

新加坡是一凡的出生地，但由于年幼时迁居古晋，并无相关童年记忆。1958年，她从古晋到南洋大学中文系就读，新加坡因缘得以重续，1962年毕业后再度离开新加坡。因此，一凡对新加坡的真正记忆源自四年求学生涯，其新加坡书写也主要聚焦于南洋大学题材，表现出鲜明的“南大情结”。在文学道路上，她的文艺启蒙与创作起步皆始于南洋大学，读大一时就上过五四成名女作家凌叔华讲授的《中国新文学》科

目。在文艺倾向上，她受当时文艺思潮影响，亲近新文学，排斥古典文学。在创作风格上，吴玲瑶曾指出，“中文系科班出身的她，不哗众取宠，不故作惊人之笔，朴素之中见纯真，这便是王昭英的风格。她写云南园的日子令人向往，可以看到一个爱好文艺青年的成长过程，一步一脚印，在任何情况下都紧紧地握着手中的笔，在乎的是追求文学的理想和薪火相传的心愿。”（吴玲瑶：86）换言之，南洋大学的学习经历对其后来的创作旨趣影响甚大，而“云南园”作为南洋大学的校园标志也就成为一再吟咏回想的对象。

就一凡的“南大情结”而论，具体表现为两大主题，一是回忆南大生涯，二是弘扬南大精神。在《回首来时路》里，她回忆从小到大的求学路，南洋大学的地位格外凸显。《圆了大学梦》则细述到南洋大学的求学经过，“南洋大学的诞生，使许多华校生的梦想成真，也圆了我的大学梦。在这之前，由于东南亚一带没有华文大学，新马及北婆一带的华校生，要上大学，除了台湾之外，只有到新加坡大学或马来亚大学去。”（一凡 1998：36）当时华校生的英文程度较差，考取新加坡大学或马来亚大学的几率很低，因此南洋大学几乎成为东南亚华校生的集体梦想。她瞒着父亲报考南洋大学，所幸父母在生活维艰之际仍勉力支持她深造，感念感恩之情油然而生。除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她对同学情、校友情、母校情也极为珍视。在散文篇中，有对云南园同学盛年病逝的缅怀（《无可奈何花落去》），有与傅文成、田思、槐华等几位南大校友共同完成《南大曲》的补记（《无心插柳——〈南大曲〉诞生记》），还有从云南园的相思树勾起的青春结缘与学子情怀（《从相思树到菩提树》）等。在为数不多的诗歌创作中，她对南洋大学同样心心念念，有对云南园的深情讴歌（《南中国海：我底梦乡》），也有依依不舍的离情别绪（《蝶恋花——忆南大》）等。

在“南大情结”中，一凡除了个体切身的回忆感念，最具族群意识与文化使命感的当属“南大精神”的弘扬。对于“南大精神”，每个“南大人”都有自己的体会。郑奋兴是南大的第一届毕业生（1956-1960），后来回校担任数学教授、系主任、院长等近十七年，他在口述历史中讲到，“歌颂南大创办人诸贤可敬又可佩的深远眼光、中华文化的智慧、舍己益人的胸怀和光明磊落的动机与豪气；歌颂那‘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极其美丽动人的云南校园；也歌颂那令人不能忘怀的‘南大人’的深厚友情，还有那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敢思敢说敢做的‘南大精神’。”（郑奋兴：xi）一凡难以忘怀郑奋兴学长等人身上所体现的为公忘私的南大精神，《动人的人文风景》便写到顾全大局的南大人文轶事，有李昭铭校长礼让办公室，有郑奋兴教授让贤院长职务，还有吴德耀教授接重任而不避嫌，这些人文风景又远胜云南园的自然景观。

在一凡心中，“南大精神”是人文并重的精神，“人”是为民众学子服务，“文”是传承华族文化。就历史价值而言，南大精神的文化象征意义要比单纯培养学生更具社会影响力。在《永远的怀念》《此地空余行政楼：参加95年校友联欢会感言》等南大校友联欢会的记述篇里，她无不将南大视为华族文化的精神家园，“世界上还没有一间大学，是由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建立起来的。南大诞生在风云激荡的年代。是先贤们排除万难，带领民众，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建立起来的文化堡垒。”（一凡 1998：38）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虽然南大历史终结，但是南

大精神的深远文化影响依然不可估量。她借用李光耀资政的话，“如果没有南大精神，新加坡就会有麻烦”，所要申明的正是南大精神所承载的华族文化传统。

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南大精神。南大精神与华族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南大精神是华族文化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华族的民族精神在云南园的体现。因此南大精神的消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文化传统的丧失。

体现华族文化传统的南大精神的落实，必须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与薪传。母语教育就是达到此目的最有效途径。（《南大精神与传统文化》）

（一凡 1998：120-121）

对于东南亚华族而言，南大精神具有相当程度的族群文化内涵，是华族文化在本土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表征。在南大精神的传承上，她自觉意识到重重危机，进而提出通过加强母语教育来传承华族文化传统的解决途径。在她看来，“南大的使命，是为了承传民族文化，南大精神是通过传统文化而体现的。因此，任何可以落实此精神的做法，都是南大校友的神圣使命。南大复校如果只是把南洋理工大学改名为南洋大学，是徒具形式而无实质意义的做法。复办的南洋大学，必须起着承传民族文化的作用，才有意义。（《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读贾南大文〈此南大非彼南大〉有感》）”（一凡 2003：64）因此，复办南大的梦想更应该付诸于具体行动，当务之急是要捍卫母语教育的最后堡垒，尤其是新马的独中、华小及所有母语学校。这样，倘若南大重办，才会有学生来源，才能真正起到传承华族文化的实际作用。她借“复办南大”谈南大精神，并不附庸复校宏愿的空谈论调，其意图在于警惕华族要维护好当下的母语教育与传统文化。

五、流散者的“乡愁情结”

一凡对“移民”“漂泊”“乡愁”等流散议题关注颇多，可以视之为创作倾向的“乡愁情结”，主要形之于散文，在诗歌、小说中偶有表现。就如诗歌《云》，含有对流浪者的漂泊隐喻，凸显出入乡随俗的在地意识。另外，微型小说《移民》暗喻文莱华人移居国外后并不如意的生活窘境，“移民前，欣宁是一间跨国公司的秘书，丈夫是油田公司的高级职员，待遇优厚。公司提供的住房既舒适又美观。家务有菲佣代劳。两口子放工后还可结伴打球才回家。日子过得既轻松又写意。可现在却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王昭英著，钦鸿赏析：113）这些自文莱再移民后的华人流散者，虽然在当地找不到理想工作，但是碍于面子，他们又不愿落魄回国。作者意在批评盲目移民而衍生的负面效应，也隐约倾吐了文莱无国籍华人的移民悲情。

在散文中，一凡对流散与乡愁有更为多元的展现。她本身并不执着于乡愁，在冷静审视一众流散者之余，却呈现出流散背后复杂的身份观与乡愁观。由于长期定居文莱，故而在文莱进出的流散者自然构成其核心视点。首先，她对乡愁有自己的深刻理解与阐发，就如《另一种乡愁》中切己体悟的乡愁哲思。

家乡！家乡！有家才有乡。当年的异乡也因我们曾在那里安过一个家而成为我们的另一个故乡。

有乡就有乡愁。而乡愁说穿了，不过是对一段日子的缱绻之情。

人对生活过的地方，都有故乡情意结。都会在离开之后不断地思念，不断地产生回去看看的念头。然而，若真的有一天得以如愿，重临旧地，却会对不依旧的江山与人事，产生怅然若失的情怀。可见怀念故土，许多时候是在怀念一段生涯。

（一凡 1998：43-44）

实际上，英国本无关乎作者的乡愁，却因儿子去监督修复留学深造时住过的旧居而引发。儿子目睹人去楼空的旧居，回想往昔岁月而惆怅伤感，于是当年临时安的一个家便成为另一种怀念空间，对异乡英国也就产生渐行渐远渐深的别样时间乡愁。

其二，呈现文莱华人不同的流散型态与生活状态。她关怀文莱流出的移民群体，《晚秋美景》里流散世界各地的马来突中华中学校友虽认他乡作故乡，但依然眷恋出生成长的文莱故土。她同情文莱华人再移民中的落魄者，《风景此处独好》在纽西兰旅行中提及从文莱移民此地的张君，他虽摆脱了文莱的无国籍人士身份，也获得纽西兰的公民权，但却无奈地处于半失业状态。她对文莱的回流华人充满理解，对返归文莱的资深作家与新闻人邱启枫表示敬意。

二十五载的漂泊生涯，二十五年的沧桑岁月，虽然加深了脸上的岁月刻痕，但亦增添了其生命的厚度。家可以是安乐窝亦可以是桎梏，处处无家处处家的邱启枫，虽有漂泊的无奈与惆怅，但却练就一颗自由的心灵。他不受制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受不同意识形态的役使。正如他在《处处无家处处家》一文中所云：“唐诗才是我的身份，我的故乡……”他，再也不必叩问乡关何处了。（《立足唐诗放眼天下——读邱启枫〈明月千里〉感言》）

（一凡 2014：125）

邱启枫将“唐诗”视为自己的身份与故乡，这是华文文化人士从中华文化经典寻求的精神寄托，文化乡愁消解并弥合了地理乡愁。这种超越地理乡愁的文化心态与一凡的乡愁理念不谋而合，中华文化成为慰藉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理想图腾。

其三，她不只关心华人流散族群，对旅居文莱的外籍人士也有关注。《故乡情意结》写到韩国人金氏夫妇，他们在文莱小镇办音乐学院四十余年，多次申请永久居民而不获，无法落地生根，最后选择回国。故乡汉城与第二故乡文莱都成为老夫妻难以割舍的乡愁牵挂，他们的孩子也各分东西，一个远嫁美国，一个因工作而四海为家，这俨然是一曲移民家庭的流散悲歌。

在诸多流散者型态中，《人生三帖》的多元流散书写最具代表性。这篇散文是作者在文莱三次接待来访朋友的真实体察，借此透视三重不同的流散人生与流散况味，且谈及流散者或淡或浓的乡愁关联。一是从新加坡回国献身理想，而后又辗转定居香

港的南大校友。二是从中国大陆迁转台湾、香港再赴文莱执教，而后退休定居台北的王老师，“在汶莱这片和平之土，他度过人生的青壮年岁月。这里是孩子们成长的家园。虽然目前一家人已适应了台北的生活，但一缕对汶莱的乡愁，还是时刻萦绕心间，常常有返来看看的冲动。乡愁说穿了不过是一段逝去的日子印痕。人无法返到过去，乡愁也因此渐行渐远渐深。”三是在南洋大学任教而后移居加拿大，却无身份认同与乡愁困扰的郑奋兴教授，“郑教授虽然离乡去国多年，并没有异乡游子的失落感，相信除了紧守本身的文化家园外，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应是重要的因素吧？！”（一凡 2003：47-50）作者的流散视域已超越文莱本土，是对海外华人多元流散者的广角审视。仅在乡愁维度，就有时间记忆型的时间乡愁，有文化家园型的文化乡愁，再次彰显了多元的乡愁理念。

六、结语

纵观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的跨国流动版图，一凡堪称其中典例。她出生于新加坡，成长于东马的砂拉越古晋，而后重返新加坡就读南洋大学，最后随夫定居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的三国流散经历，对她的文学创作有着显著影响。一凡虽然被定位为文莱华文作家，但是其创作视域并不局限于文莱，而是表现为特征鲜明的东南亚区间流散书写以及中国性书写。在流散书写方面，由于华校教育背景，她对中国有着文化维度的“原乡情结”；对长期居住的古晋与文莱，蕴蓄着强烈的“家国情结”；对出生地与求学地的新加坡，则是浓重的“南大情结”；还有流散者超越地理疆界的多元“乡愁情结”。诸般“情结”，聚焦投射出跨国流动的多方印迹，而流散也赋予她创作视维上的一体多面。

实际上，在东南亚地区，一凡的多元流散情况复杂。在多元流散之中，一凡在文莱生活的时间最长，从组建家庭到年华老去，她大都居住于此，由此而生的文莱“家国情结”当然占据最大比重；其次，当属“原乡情结”，如果说文莱的“家国情结”占有地理空间优势，那么“原乡情结”则占据了更多的心理空间。或者说，在地理家国的富足安乐之余，她还有着更为高远的对心理家园的精神追求。当然，她的诸般流散并不是断然切割，而是表现为互相的生发糅合。由于本身的华校生身份，她的“家国情结”“南大情结”中也含有文化层面的“原乡情结”，而“原乡情结”也不限于源自中国的文化原乡，还具有流散南洋而生根发芽的华侨华人文化，或称之为流动性的“在地的文化原乡”。同时，她的“乡愁情结”也不限于一国一地，而是“原乡情结”“家国情结”“南大情结”的混融交织，已然超越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甚至含括了英国，体现出“乡愁”随流散而不断的丰富延展，或称之为全球化的“随地迁转的乡愁”。

当然，一凡的创作并不限于流散书写。在文莱华文文坛，一凡对文学抱有持久热情，她视文学为自己的“宗教”与“信仰”，对艰难前行的文坛文学也满怀信心。在创作体裁上，“她是写作上的‘多面手’，诗歌、散文、微型小说、评论多有涉猎。”（一凡、赵朕：37）她的诗歌作品较少，后期大量尝试微型小说写作，但最出色的应数散文，另有数量可观的作家作品评论及文坛文学史论。在散文创作中，流散

书写与移民议题最具特色。她的微型小说则讲究叙事技巧的精妙营构，对华人社会的自私自利、爱慕虚名、人情冷漠、趋炎附势等陋习弊病深具批判警戒功能。正如钦鸿所言，“一凡微型小说中更多的是一些对于丑陋的生活现象的揭露和鞭挞，这也是她关心社会、干预生活的积极的表现。”（钦鸿 2012：2）在文华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她以作家兼民间学者的双重身份撰写了不少史料文章，在文华文学的发展与研究都相对薄弱的现状下，对文华文学史具有一定的建构意义。在文学活动方面，她是文莱两大文艺组织——留台同学会写作组与华文作家协会的重要参与者。她倡导不同文学组织的团结协作，也认可“和而不同”的彼此尊重。朱文斌指出，“一凡是一位心系天下善于思考的文学女性，在她的思想意识深处，发展文莱的华文文学，加强与世界华文文坛的接触和交流，一直是她关心的主题。”（朱文斌：301）她广结全国各地文友，对煜煜、一粟、语桥、梁友情、傅文成、胡斐、邱启枫等文华作家，对吴岸、朵拉、戴小华、晨露、金树凰、陈瑞猷、风沙雁、寒川、方桂香、林忠民等东南亚华文作家，还对美籍华裔作家王克难、新西兰作家孙嘉瑞、澳洲作家心水等，或记述文友情缘，或进行作品评析。总得来说，一凡在文华文坛的流散书写、整体创作、文学史梳理、文学活动贡献等领域的成绩皆蔚然可观。

参考文献

- 钦鸿，2002，《遥望集：东南亚华文文学漫评》，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页268-269。
- 钦鸿，2012，〈汶莱女作家一凡的微型小说创作〉，《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页2。
- 芮华、赵联，1999，〈疏离婉约 企恋刚健：谈文莱华文作家一凡的文学创作〉，《平原大学学报》，第3期，页62。
- 王昭英著，钦鸿赏析，2008，《一凡微型小说及其赏析》，新加坡：斯雅舍。
- 吴玲瑶，2010，〈淡淡字句浓浓情〉，诸家，《山岩上一泓飞珠溅玉的清泉：一凡文学意境探究》，新加坡：斯雅舍，页86。
- 一凡，1998，《洒向人间都是爱》，新加坡：岛屿文化社。
- 一凡、赵联，1999，〈路漫漫而修远的“文华文学”：文莱华文文学概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第2期，页37。
- 一凡，2003，《跨越时空的旅程》，新加坡：创意图工作室。
- 一凡、刘华源，2006，《双飞集》，新加坡：创意图工作室。
- 一凡，2014，《感时花溅泪》，新加坡：斯雅舍。
- 郑奋兴，2011，《郑奋兴讲南大故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页xi。
- 朱文斌，1999，〈一凡〉，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厦门：鹭江出版社，页301。